

在我们敬爱的
老校长李达同志的
冤案得到彻底平反
昭雪的今天，缅怀
他的音容笑貌和生
平事迹，真令人百感交集。

百感交集怀李老

陈忻蒂

李达同志作为参加党的创建事业的共产主义战士和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我国革命事业和理论宣传工作所建立的伟大功绩，已经永垂青史，用不着我来多说。我作为李达校长亲自重新创办的武大哲学系一名老教师，只想谈点和他亲身接触所得的深切感受，以见他作为一位教育家和大学校长、系主任、党的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和思想风貌。

1956年上半年，我还在北大哲学系工作。当时北大的有关领导人已告诉我说李达校长确定在武大重新创办哲学系，已得高教部同意要在院系调整前曾在武大原哲学系工作过的部分教员回武大工作，并已确定我也

属于其中之一。我当时虽表示组织上服从，但心里很不愿意。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过不多

久，李校长竟亲自上我家来了，既谈了他重新创办哲学系的意义和打算，又表示了邀请我们回武大帮他一道办好哲学系的一片诚意。我还清楚记得，他在我家坐下不久，就感到胃痛难忍，陪同他的同志当即送上一包随身带的饼干，他一面就着茶水吃了几片压压胃酸，一面忍痛和我谈话，原来他是带着一身病痛，在亲自为办学事业奔波！而态度还是那样和蔼、诚恳、亲切。以后到我57年秋重来武大以前，李校长每次去北京，都还要见见我和其他已决定来武大工作或由武大派往北京进修的同志，不是亲自一家一家去拜访，就是派车把我们接到他的寓所相聚。57年秋我来武大时，李校长又亲自过问我的住房问题，并在我到校的次日，（下转43页）

本《社会学大纲》的自编教材。有一天鹤师来上课了，他出奇地不带讲稿，面部戴着个大口罩，登台一言不发，先在黑板上直书“哑子讲课，以笔代口”四个大字，随后便这样讲起来，其板书之快是惊人的。下课之后，同学们不仅赞叹老师的记忆、高度思维能力和飞快的板书本领；同时更敬佩他带病上课，对教学负责的精神。鹤师除对上课认真负责以外，即在课余，对求教的同学，解答也是很认真的。当年有部分同学自学《资本论》，由于中译本只有第一卷的少部，一般都读日文译本，困难很多。为此我曾向鹤师请教，他除了解答具体问题以外，还说：要学日本河上肇，刻苦用功，河上肇把《资本论》读得是很熟的。年老的一些同志们都知道，也就是在那二三十年代，正是鹤师把河上肇的一些名著翻译在国内出版了，起了不小的进步作用。

鹤师不仅在校内精心培养同学，同时也在社会上注意培养并选拔进步教师。如前不久逝世的吕振羽同志，当年在北平一个大学里教中国古代史课，每当他课余到鹤师家来，鹤师对他的培养帮助也是无微不至的。又如张友渔同志，当年在北平一家报社任主笔，他曾到法商学院经济系兼课，也是与鹤师在经济系任教分不开的。后来鹤师出任经济系主任了，有一天他在家对我说，要请钱俊瑞到系任教，只是抗战爆发了，没有得到实现。

鹤师的一生，是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战斗的一生，在这方面他有突出的贡献。上述回忆，仅仅是他那突出贡献中一点小小的印证。面对鹤师有贡献的一生，我常想，自己虽然是他熟识的一个学生，但实际上不配称为他的学生。这不足之处，就由继续努力学习和工作来不断地填补吧。

还说，论述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时要实事求是，不要硬讲成这也“发展”，那也“发展”，甚至把一个新的用词、新的语句都说成是“发展”。他认为毛泽东思想的特点与优点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因而他所拟定的历史唯物主义编写提纲，其中标题用的就是《中国革命的唯物史观》、《中国共产党的中国革命论》，他不同意离开真理的具体性而片面夸大毛泽东思想的世界意义的作法。1966年初，康生找他去传达所谓“精神”，说辩证法只有一条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这是唯物辩证法上的一元论。他认为这没有什么道理，仍然坚持三十年前他在《社会学大纲》中论述的观点，并断然对助手说，这是学术问题，同谁都可以争鸣，我们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书还是照原来那么写。

李达同志不仅在理论上始终保持坚定的原则性，而且在政治上也能十分敏锐地觉察和抵制“左”倾思潮。同志们回忆说，李达同志对1958年出现的“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坚决反对，他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多次说：象这样搞下去，共产主义会变成破产主义，大跃进会变成大后退，人民公社会变成人民空社。列宁说过不能剥夺农民，我们为什么要剥夺农民？违反客观规律是要碰得头破血流的。他针对那时“左”的错误，写了《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阶段》一文，并在学校的党代会上作了发言，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阶段，不能混为一谈；要看到我国“目前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毕竟还是相当低的，我国现在还是处在社会主义阶段，社会消费品的分配还不得不适应按劳分配的原则。”要保持冷静的头脑，“区别事物的真象和假象，区别有根据的要求和没有根据的要求”，反对“降低共产主义的标准，助长平均主义倾向”。1959年他在青岛，当一位负责同志向他讲了

（上接32页）这是他一九四七年在湖南大学法律系任教时编写的讲义。在这部讲义中，他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西方各个法学流派的学说，作了简要的介绍和深刻的批判。从这部讲义中，可以看出他为我国的法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子。我们不妨说，他是我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法学的一位拓荒者和带路人。他的这部讲义是我国法学研究中的重要文献，也是他对我国法学的重大贡献。武大法律系编辑的《法律研究资料》，已将其中“各派法理学之批判”一篇分期陆续发表，以供有志研究法学的同志们学习参考。写到这里，不禁联想起他的不幸去世。如果他还健在的话，我想他一定会为我们新中国的法学继续作出他的可贵的贡献的。

庐山会议的情况后，他心情沉重地对陶德麟、肖麓父同志说，“现在本来应该反左，怎么反右来了？”“党内出了怪事！”他认为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说彭德怀、黄克诚等同志反党，那“不可能”，“想不通。”1962年他回到家乡零陵亲自进行社会调查，了解“五风”的危害和农民的反映。他明知彭德怀同志因为写了意见书而受了严重打击，还是毫不含糊地对零陵县委的同志说：“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他把自己调查所得的情况要秘书曾勉之同志整理成书面意见，由他本人当面交给县委和湖南省委负责同志。在庐山会议及全国反“右倾机会主义”之后，他仍然不畏风险，敢于上书直言，充分表现了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度责任感。他对教育战线上出现的“左”的做法，也能敏感地觉察和坚决地抵制。1958年哲学系师生下乡劳动时间太长，影响了专业学习，他非常不满。他说：“学生尽搞劳动，大学还成其为什么大学呢？”一再指示系里负责同志催促师生赶快返校。他对当时学校搞的“拔白旗”、“师生打擂台”，打乱教学秩序的做法坚决反对，认为这样的“革命”是“胡闹”。有人提出要打倒牛顿和爱因斯坦，他说：“科学的权威是打不倒的”。实践证明，他的这些观点是正确的。1966年3月间林彪鼓吹的“顶峰论”喧嚣一时，他不畏权势，挺身而出，理直气壮地进行驳斥说，是“顶峰”，不发展了吗？有人当场提醒他，那是林彪讲的，他毫不犹豫地：“我知道是他说的。不管那个说的，不合乎辩证法，我不同意！”正因为这样，他遭到了迫害，于1966年8月24日含冤去世。同志们说，李达同志的一生是为真理而斗争的一生，他虽然去世了，但他为捍卫真理而献身的革命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海波、王鲁整理）

（上接36页）就亲自去我家看望。我也就是在李校长一片诚心的感召下，终于消除了不愿来武大工作的情绪，而暗暗下决心应在这里好好工作。回想起来，我当时不过三十几岁，还是个名副其实的青年教师，而李校长呢？就不说他的名望、地位，单就年龄说当时也长我一倍，但却始终以平等态度对待当时的我和其他象我一样的年轻人。对比之下，今日有些部门的有些领导，不仅不去主动接近群众，甚至群众登门求见也难上加难，能不叫人感慨不已吗？李校长这种热心办学、奋不顾身的精神，和关心人、尊重人、平等待人的思想作风，也是党的优良传统的生动体现，将永远铭刻在我心中，激励我前进！